

章惠康 易孟醇 主编

後漢書今注今譯

巴蜀書社出版

章惠康 易孟醇 主编

上册

五经古今注

子解

岳麓书社

护封题字：王元化

扉页题字：王子野

凡 例

一、本书旨在帮助读者读懂《后汉书》原文。注释广泛参考古今各家的注解，择善而从，定于一是，力求简明扼要。译文循“信、达、雅”原则，以直译为主，辅以意译，力求准确流畅。

二、本书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广泛参考他种版本（包括今人的点校成果），对“点校本”有明显错误的文字、标点，或径直改正，或在注释中略加说明。

三、为方便读者，本书将原文中的繁体字、异体字全部改为简化字。通假字则不改。但在译文中上则改成现在的通用的字。

四、本书注释内容包括字音、词义、人名、书名、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及有关史实。职名、地名一般不作注释。另编有古今地名对照和两汉职官录附于书后，以便读者检索。

五、注释以卷为单位，卷内同一注目力避重复，但各卷之间不避重复，以免读者翻检之劳。

六、凡本书内有单传的人物，则只注明详见本书卷××本传；本书内无传的人物，则简要介绍其生平，并依据理解原文的需要程度对有关事实加以说明。

七、本书根据内容和分量分三册。上册从卷一至卷四十一；中册从卷四十二至卷八十一；下册从卷八十二上至全书之末。

序

章惠康等同志的《后汉书今注今译》出版了。这使近几年日益繁荣的古籍今译成果中增添了一部重要的著作，是值得高兴的。

《后汉书》是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中的第三部，也是二十四史中有影响的著作。章太炎先生认为，“《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略论读史之法》）表明了学界对这部重要史书的重视。但是《后汉书》成书于南朝刘宋时代，距离今天当然太遥远了，今天的读者要读懂这部纪传体的东汉史，当然也就十分困难了，但有了章惠康同志的《后汉书今注今译》，凡能读懂报纸的人就都能读懂它了，所以值得高兴。

有计划地、系统地做好古籍今译工作，是陈云同志首倡的，也是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明确提出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自一九八六年起就组织全国十馀所大学的古籍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编纂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经过八年努力，完成了全套 135 种的今译任务。我在为那套丛书写序中曾说，古籍今译是“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任务，“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那时候古籍今译工作刚刚起步，愿意做这件事的人还不多，我们强调古籍今译工作的艰巨性和重要性，是为了纠正视古籍今译这种普及工作为雕虫小技的那种偏见，同时，也是为了提醒从事今译工作的人要注意质量，不要掉以轻心。现在古籍今译逐渐“热”起来了，古籍今译中的质量问题也逐渐突现出来了，甚至出现了一批粗制滥造的“今译”作品。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要反对和抵制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的今译，但反对粗制滥造的最好办法不是因噎废食地停止今译工作，而是提倡严肃认真的讲求质量的今译。我相信，经过读者和时间的检验，粗制滥造的今译作品一定会被淘汰，而严肃认真讲求质量的今译著作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像章惠康同志那样，用一定的时间作些古籍今译工作，使我们中华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繁荣。

周林

七月四日

（一九九五年）

《后汉书》述略

史 叔

《后汉书》为“前四史”之一，是一部纪传体东汉史。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迄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记载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间的史事。

《后汉书》由本纪、列传、志三部分组成。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成于范曄之手，唐高宗第六子章怀太子李贤（公元655—684年）等作注。志的部分，范曄未及完成便被杀了。到南梁时，史学家刘昭（字宣卿）以范曄《后汉书》只成纪、传而无志，就把西晋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司马彪（字绍统，约公元246—约306年）所撰《续汉书》的志八篇抽出来^①，加以注释，析为三十卷，附在范书后面。至北宋真宗（赵恒，公元997—1022年在位）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经孙奭（shì字宗古）的建议，才把两书合刻在一起，成为一部书^②，至此始有完本。现在通行的本子（中华书局校勘本）就是合成后的《后汉书》，共计一百二十卷。

范曄（公元398—445年），南朝刘宋史学家。字蔚宗，小字砖^③。顺阳（今河南省淅川县东南）人。生于东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二年，卒于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二年。他的家庭世代为官。曾祖父范汪（公元301—365年），东晋时曾任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博学善文。祖父范宁（公元339—401年），东晋时曾任豫章太守，曾给《谷梁传》作注，以经学名于时。父亲范泰（公元355—428年），东晋时为太子博士，骠骑谘议参军，中书侍郎。入南朝宋，受任国子祭酒，后来又任侍中、左光禄大夫等职。少帝（刘义符）时，加位特进，死后追封车骑将军。平生博览群书，好为文章，有文集流传于世。范曄，为范泰第四子。南朝梁文学家沈约称赞他：“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④。他从小过继给堂伯父范弘之，因而袭封武兴县五等侯的爵位。十七岁以后，历任秘书丞、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后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曾经掌管禁军，参与机要。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被徐湛之告发，因参预孔熙先等谋立宋文帝的弟弟彭城王刘义康（刘裕第四子）为帝之事^⑤，以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刑。时年四十有八。

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冬，范曄三十五岁作尚书吏部郎时，闯下大祸。当时刘义康生母彭城太妃病死，范曄因深夜在房中饮酒，开北窗听挽歌以取乐，被人告发，贬为宣城太守。在任上郁郁不快的情况下，开始“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⑥，发奋从事《后汉书》的撰写工作。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

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惟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⑦在他看来，前人著述多有不够理想，即使名家班固，他也认为有不尽如意之处。因此他收集从东汉至刘宋，各家编著的记载东汉一代历史的史书二十种，十八家，卷数多达一千零四十九卷^⑧，以《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博采群书，斟酌去取，删繁补略，经历十三年（公元432—445年），“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⑨。该书问世后，诸家汉史具为所掩，黯然失色，便逐渐被淘汰。特别是唐代李贤等作注后，研究东汉历史的人大都阅读范书，而世间曾有《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并提的“三史”之称，在范晔的《后汉书》写成后，“三史”就改指《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公元661—721年）非常称赞《后汉书》，他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⑩

范晔《后汉书》有如下特色：

1. 在体例方面：（1）在本纪中，新增《皇后纪》。这与《史记》、《汉书》列入外戚不同。东汉时期皇帝年幼，朝政多由皇太后秉持。如临政者窦、邓、阎、梁、窦、何六后。和帝册立，当时只有十岁，窦皇后（即章德窦皇后）尊为皇太后，太后临朝，皇太后之兄窦宪辅政。和帝死去，皇后邓氏（即和熹邓皇后）为皇太后，先立只有三个多月还在襁褓中的刘隆为帝，是为殇帝。殇帝夭折，再立十三岁的刘祜为安帝，邓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与其兄邓骘专权。安帝死去，皇后阎氏（即安思阎皇后）与其兄阎显定策扶立北乡侯刘懿为帝，是为少帝。阎太后临朝称制，太后之兄阎显执政。刘懿只做了八个月的皇帝死去。安帝之子年仅十一岁的刘保继位，是为顺帝。顺帝死去，皇后梁氏（即顺烈梁皇后）与其兄梁冀选立不到二岁的太子刘炳嗣位，是为冲帝，不到半年死去。又立章帝的玄孙年仅八岁的刘缵，是为质帝。质帝被“拔扈将军”梁冀毒死，又迎立十五岁的刘志为桓帝，梁氏兄妹专权朝廷。桓帝死去，窦皇后（即桓思窦皇后）成了皇太后，与其父窦武定策迎立十二岁的刘宏为灵帝，皇太后临朝称制，窦武执掌朝政。灵帝死去，十四岁的皇子刘辩继位，是为少帝。何太后（即灵思何皇后）临朝称制，其兄何进执掌朝政。一百年间，六位太后临朝。幼主在位，政由后出，所以增加《皇后纪》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皇后纪》分上下二卷。上卷记光武、明、章、和帝的六位皇后、三位贵人。下卷记安、顺、桓、灵、献帝的九位皇后、二位母后、二位美人、一位夫人及弘农王唐姬。纪末又分载各皇女，计世祖五女、显宗十一女、肃宗三女、和帝四女、顺帝三女、桓帝三女、灵帝一女。这样东汉一代宫闱之事，详备了。（2）对于幼帝，采取附记的写法。东汉时期皇帝幼小就即位，在位时间不久，事迹很少，就并入其它皇帝纪中。如殇帝刘隆，接位时只有三个多月，还在襁褓中，在位不足八个月，就归附在《和帝纪》中。冲帝刘炳，接位时年纪不到两岁，只做了不到半年的皇帝。质帝刘缵，即位时年仅八岁，不到一年就成了梁氏集团的牺牲品。冲、质两帝归附在《顺帝纪》中。（3）在列传中，根据东汉社会的实际情况，增创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和《列女传》。以上七个类传或揭露东汉时期宦官和外戚两个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或写出宦官与党人两股势力的对立与消长；或记载中下层人士进入仕途的艰难以及对统治阶级的愤恨和抗争；或

记述尚气节重操守的知识分子的言行和功绩；或记载遁世避祸、自命清高之士；或记载医巫卜筮、神仙怪异的方术之士；或表彰卓越女子的聪明才智、嘉言懿行等。这些类传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东汉纷繁的社会面貌，体现了东汉时期的时代特点和社会风尚，也较全面地表现出范曄在撰史方面的创新精神。所以清代学者邵晋涵（公元1743—1796年）说：“东汉尚气节，此书创为《独行》、《党锢》、《逸民》三传，表彰幽隐，搜罗殆尽。”又说：“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又说：“《儒林》考传经源流，能补前书所未备。”^⑩

2. 在史料方面：保存了东汉这一时代的有关史料。《后汉书》引用第一手材料较多，有关重要奏疏、论文和诗赋，都收录在某些传中。如《桓谭传》（卷二十八上），载其《陈时政疏》和《言图讖疏》。《冯衍传》（卷二十八上下），载其《说廉丹》书、《说鲍永》书和《显志赋》。《班固传》（卷四十上下），载其《两都赋》、《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和《典引篇》。《王符传》（卷四十九），载其《潜夫论》中的五篇：《贵忠篇》、《浮侈篇》、《实贡篇》、《爱日篇》、《述赦篇》。《仲长统传》（卷四十九），载其《乐志论》及《昌言》中的三篇：《理乱篇》、《损益篇》、《法诫篇》。《崔寔传》（卷五十二），载其《政论》。《张衡传》（卷五十九），载其《客问》、《上疏陈事》、《请禁图讖疏》和《思玄赋》。《蔡邕传》（卷六十下），载其《释海》和《条陈政要所当施行七事疏》。《左雄传》（卷六十一），载其《陈政事疏》。《荀爽传》（卷六十二），载其《对策书》。《荀悦传》（卷六十二），载其《申鉴》。《文苑传·杜笃传》（卷八十上），载其《论都赋》。《文苑传·刘梁传》（卷八十下），载其《辩和同之论》。《文苑传·边让传》（卷八十下），载其《章华赋》等等。这些奏疏、文章既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也为后人研究东汉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这些材料也全赖范曄《后汉书》的引用，才得以保存下来。

3. 在编撰方法方面：循《史记》以类相从之法，立传偏重于类传。《后汉书》所记人物有五百多人，这比《史记》、《汉书》多得多。除单传外，更多的是用类传。类传是合传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受时间先后的限制，把同一类人物，或社会身份、职业相同，或人品、事迹相近等归在同一类传中，除所增创的七个类传外。又如卷二十五卓茂、鲁恭、魏霸、刘宽都有宽仁恭爱之称，为政宽恕，有治绩，合为一卷。卷三十上下苏竟、杨厚、郎顗、襄楷，都以讖纬术数之学条陈规劝时政，合为一卷。卷三十一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王堂、苏章、羊续、贾琮、陆康，或为东汉初人，或为安帝时代人，或为灵帝时代人，都因在当时牧守刺史中治理政务成绩优异特出，所以编在同一卷。卷三十二樊宏及其子樊儵、族曾孙樊准，阴识及其弟阴兴，都是外戚（樊宏为世祖光武帝刘秀之舅；阴识为光烈阴皇后之前母兄）而有功绩，所以不入外戚而另列一卷。卷三十五张纯、曹褒、郑玄，或为东汉人，或为章、和帝时代人，或为汉末人，都因博通经学，便合为一卷。卷三十八张宗、法雄、滕抚、冯缉、度尚、杨璇，或为东汉初人，或为东汉末人，都因为政严厉，能剿贼安民，所以列为一卷。卷三十九刘平、赵孝、淳于恭、江革、刘般、周磐、赵咨，都有孝行，便编为一卷。卷四十四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都是笃厚有志节，人品相似，因而合为一卷。袁安、张酺、韩棱、周荣、郭躬、陈宠，都因明了法律，决狱公平适当，编在四十五、四十六卷中。卷四十七班超、梁懂，都以立功于辽远的西

域,便编为一卷。卷四十八杨终、李法、翟酺、应奉和其子应劭及霍谡、爰延、徐璆,都有文才,或为名儒,或博通群书,或有著述,合在同一卷中。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或为东汉初人,或为东汉末人,三人都是东汉思想家,擅长著述,又淡漠功名利禄,便编在同一卷。卷五十三周燮、黄宪、徐稚、姜肱、申屠蟠,都是志行高尚之士,因高隐不仕,故合为一卷。卷五十七杜根、栾巴、刘陶、李云、刘瑜、谢弼,都是坚持气节,能够直谏,不避死亡,便编为一卷。卷五十八虞诩、傅燮、盖勋、臧洪,都深明大义,直道而行,便编为一卷。卷六十六陈蕃、王允,都以为国除恶而死,合为一卷。卷六十八郭太、符融、许劭,都以清高有人伦之鉴而知名于世,便编为一卷。卷六十九窦武、何进,都为外戚,又因诛宦官不成而死,编为一卷。卷十一至十三记两汉之际起义领袖和割据领袖人物。卷十四、十五记光武帝时的宗室王侯。卷十六至二十二记中兴二十八将。卷七十六至八十四记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九个类传。八十五至九十卷是记边疆兄弟民族的列传。

4. 在观点方面:立论持平,褒贬允当。范曄编纂历史有明确的目的。他说“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②。他特别通过篇首的序、篇末的论、赞体现出来。他非常着意于序、论、赞的写作,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范曄自诩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③。又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④。无怪乎后人称二十四史中的史评,首以《后汉书》为佳。范曄在《宦者列传》(卷七十八)的序中述说了宦官的由来,政治地位的发展变化及其败坏国家的情况。序文(大意)说:从明帝以后宦官的委任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宦官得以手握封爵重权,口含王法诏命,以至后来戴高冠携长剑,佩朱绶挟金印的宦官,布满宫廷……他们的官府,星罗棋布在大小城邑,子弟宗族及依附者,分布在半数以上的郡国。他们剥削残害黎民百姓,诬蔑陷害忠良,专心树立党羽,互相提拔推举,败坏国家,祸患朝政,使国内怨声载道,志士无处安身,寇盗乘机而起。他们更大兴党锢之祸。受迫害者相互诬告牵扯。序文又说宦官“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真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范曄在篇末论曰:“自古丧大业绝宗祗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阹尹倾国。”西汉亡于外戚;东汉亡于宦官。这话确实说得不错。东汉宦官之所以受宠信,这与外戚当权形成的祸害有密切的关连。《皇后纪》(卷十)的序中说:“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按谓安、质、桓、灵),临朝者六后(按谓章德窦皇后、和熹邓皇后、安思阎皇后、顺烈梁皇后、桓思窦皇后、灵思何皇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婴缢继于圜犴之下。湮灭连踵,倾轹继路。而赴蹈不息,焦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从东汉和帝开始,朝政由太后把持,太后援引自己的父兄掌权。太后和她的宗族为了长期把持政权,多立幼童当皇帝。小皇帝长大后不甘心被外戚控制,就要寻求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于是身边的宦官就成了皇帝唯一得力的助手。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专权的外戚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发展成了一

种政治集团。但无论宦官专权或外戚当政，朝廷腐败，社会黑暗，平民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列女传》（卷八十四）是范曄首创的，这无疑肯定了妇女的历史地位。范曄为“才行尤高秀”的十六位妇女立了传。如赞美鲍宣妻桓少君与夫同志；乐羊子妻劝夫成德；王霸妻为夫解慚；姜诗妻助夫尽孝；袁隗妻马伦不屈辨诘；程文矩妻李穆姜可为继母之法；吴许升妻吕荣义无离贰；皇甫规妻矢志不随董卓；盛道妻赵媛姜劝夫潜逃，周郁妻赵阿因夫自杀；叔先雄徇父沉水；庞涓母杀仇自首；曹盱女娥永传孝女之名；曹世叔妻班昭学问广博、才识高深；董祀妻蔡琰博学有才等等。在序中说：“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范曄在《党锢传》（卷六十七）中为刘淑、李膺、杜密、范滂、张俭等二十一人立了传。在序中叙述了党事的原起及党祸的始末。在宦官外戚交替专权的黑暗时代，激起了士大夫的强烈不满。他在文中指出：“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书中详尽地记录了党人的事迹，歌颂他们在恶势力面前坚贞不屈勇于斗争的精神。作者对东汉士人君子遭小人的毒害连类受祸之惨，为之太息痛恨。刘知几对范曄的论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史家作论“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俚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⑮

此外，《后汉书》在写作上也具有特色。刘知几说《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⑯清代史学家赵翼（公元1727—1814年）说：《后汉书》“详简得宜，无复出叠见之弊者”。^⑰该书断限完整，结构也严密，又有较高的文学成就。所以范曄曾自负地说：“自古体大而思情，未有此也。”^⑱《后汉书》具有以上特点，为后人所重视。南宋学者王应麟（公元1223—1296年）叹曰：“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⑲近代学者黄侃（公元1886—1935年）说：“吾读范汉书，虽欲罢而不能也。”^⑳可见《后汉书》无论从文字到内容，都是比较好的一部史学名著。所以，史学家刘节说：范曄“在文体技巧方面是不下于马、班的”。^㉑

注释：

①即《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志。 ②见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范曄《汉志》”条。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传”条。 ③“母入厕产子，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引见《宋书·范曄传》。 ④⑦⑨⑫⑬⑭⑮引自《宋书·范曄传》。 ⑥范曄谋反问题，历来学者各说不同。可参阅吴树平《关于范曄谋反问题的探讨》一文。收入《秦汉文献研究》一书中。齐鲁出版社出版。 ⑧⑩引自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所说。 ⑪⑫⑬引自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论赞》篇、《补注》篇。 ⑭《南江书录》。 ⑮《廿二史札记》卷四。 ⑯见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所引。⑰转引自谢国桢著《史科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⑱《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出版。

《后汉书》的“正一代得失”

易孟醇

与《史记》、《汉书》相较，《后汉书》和较它早成书百馀年的《三国志》一样，无表无志。表，是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的，“而范书阙焉，使后之学者无以考镜二百年用行政之节目，良可叹也”；“其后作者又援范书为例，年表皆在所略”^①，成为始作俑者。对于志，范曄却是有意撰写的，他自述说：“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②当时，他“所撰十志，一皆托俨”^③，可是，范曄与谢俨相继被害，《志》稿散失。南朝梁人刘昭知范曄“及语八志，颇褒其美”，乃将晋人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④。此八志，“虽未尽善，而大较多实”^⑤。所以到了宋真宗乾兴元年，便有孙奭建议将彪志与范书合刻。但清人邵晋涵认为，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的上述说法，“考之不审”，“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则知以司马《志》附见范书，实始于唐人”^⑥。从以上这些人所共知的史事，可知范曄撰史，总体上未出迁、固范围。

但是，与迁、固相较，范曄却增加了《皇后纪》，增加了宦者、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七个类传。这，当然不可视为篇目的一般调整，属布局谋篇的问题，而是范曄的史学思想的深刻表露。

任何史家的史学思想，核心是史学目的。孔子作《春秋》，旨在通过所谓“微言大义”，有所褒贬。他坦率地承认：“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⑦故孟子称赞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⑧司马迁也说：“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⑨后来司马迁本人著《史记》，则提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司马迁的时代，天运天命，四气五行之类，都是自然界及其规律在人们心目中的一种混沌沌沌的、带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反映；司马迁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去推究天人关系，虽然也发出了许多让后人惊叹不已的闪光点，但总起来说，终究还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至于“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由于撰写了第一部中国通史，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的，他为“通变”事业立下了首功。可以说，从古至今的众多史学家无不是司马迁开创的“通变”事业的继承者与创新者；他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永远是一项基本的治史原则和治史方法。迨至班氏父子作《汉书》，其史学目的，便没有司马迁那么宏大了。《叙传》明言是要“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就是说，他写的《汉书》是以五经为衡量历史的标准，以博洽为手段，以证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的所谓“事实”，阐述汉“纂尧之绪”，神圣不可犯。章学诚评论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墨墨。”^⑩足见班固的史学目的是一种为当代封建皇朝服务的实用主义。而范曄作《后汉书》，目的更为

实用：“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①范曄这个出身于门阀世族的朝廷命官，要“正（东汉）一代得失”，自然是要为地主阶级寻找更有效的统治术。这一层自不必说。不过，正得失，就必下褒贬；下褒贬，就需原始察终，探源溯流；于是在这些原始察终、探源溯流的细微处，便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了范曄与其前辈史学家的不同。这些不同处，正体现着范曄的创新与史识。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②这可谓欲“正一代得失”的范曄于一千二百年后得一知己。

范曄为达到自己的史学目的，也学习与运用《左传》以“君子曰”、《公》《谷》以“公羊子曰”“谷梁子曰”、《史记》以“太史公”、杨雄《史记》以“撰”、《汉书》以“赞”、荀悦《汉纪》以“论”、《东观汉记》以“序”、谢承《后汉书》以“论”等，“其名万殊，其义一揆”^③的传统手法，于篇首作《序》，篇末作《论》、《赞》，来直接表达自己对东汉政治、经济和人物的见解。序论本“所以辩疑惑，释凝滞”，但文人好舞文弄墨，故自迁、固以降，序论“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俚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④。而范曄则自诩更高：“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论》。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谈，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⑤姑不论这些话是否夸饰，但《后汉书》的序、论、赞，确实处处可看到范曄“正得失”的旨意。如《儒林列传》的《序》述东汉儒家兴衰的原因，《宦者列传》的《序》论宦者从周秦至两汉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以及他们专政的由来，《党锢列传》的《序》叙战国以来时君的好尚与士风的演进等等，均极深刻。又如《邓寇列传》的《论》言外戚专权的恶果，也极精彩：“汉世外戚，自东、西京十有馀族，非徒豪横盈极，自取灾故，必于貽衅后主，以至颠败者，其数有可言焉。何则？恩非己结，而权已先之；情疏礼重，而枉性图之；来宠方授，地既害之；隙开势谢，谗亦胜之。”然而，作为史书而非政论，范曄的“正得失”，主要精力用在史料的选择排比和详略的处理上，寓论断于叙事之中。

东汉诸帝，除光武年六十三逝世，献帝禅位后年五十四逝世外，余十一帝皆早殇：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殇帝仅两岁，安帝年三十二，顺帝年三十，冲帝仅三岁，质帝仅九岁，桓帝年三十六，灵帝年三十四，少帝（后被废为弘农王）年十七。皇帝早死，继位者必年幼，他们继位时的年龄：章帝为十九岁，和帝仅十岁，殇帝刚满百日，安帝十三岁，顺帝十一岁，冲帝仅两岁，质帝仅八岁，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二岁，少帝十七岁，献帝九岁。继位者年幼，母后必易临朝，东汉前后垂帘听政者有六人：和帝时，窦太后称制；殇帝和安帝时，邓太后终身称制；北乡侯刘懿嗣位时，阎太后临朝；冲帝、质帝和桓帝时，梁太后临朝；灵帝时，窦太后临朝；少帝继位后，何太后临朝。东汉近二百年间，太后临朝的时间长达四五十年。这个史实怎能不使范曄新立《皇后纪》以理纲目、纪大事呢？《史》、《汉》除吕太后入纪外，其余皇后的行迹，仅在外戚世家或外戚传中言及。《后汉书》在纪传体史书中新立《皇后纪》，是与东汉的政治实际相吻合的。清人何焯称赞道：“作《皇后纪》，为得其实，虽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学之

变，未可议也。”^⑩

且范氏立《皇后纪》，另有其“正得失”的深意。他在这篇纪的《序》中说：“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因为，“专任妇人”，必致“外姻乱邦”。他叙述东汉的情况说：“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这就是说，“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⑪。窦太后临朝，窦宪揽权；邓太后临朝，邓骘辅政；阎太后临朝，阎显掌权；梁太后临朝，梁冀当政；窦太后临朝，窦武专权；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东汉后期接连不断形成外戚集团，其势力逐渐膨胀，实际上使东汉“皇统屡绝”。

但是，外戚“利深祸速”，权重必然祸亦随之。当幼年岁渐富，自然不满大权旁落，欲寻求可作自己依靠的新的政治势力，于是皇帝身边“供使令、效趋走”的宦官乘机而起，他们“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纳之命”。和帝依靠宦官郑众等，翦灭了窦宪集团；安帝利用宦官李闰、乳母王圣等人的谗言，逐杀了邓氏家族；宦官孙程等杀阎显，立顺帝；桓帝依靠宦官单超等人，杀梁冀等数十人；灵帝依靠宦官曹节等，杀窦武；何进谋诛宦官，反被宦官处死。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争斗不已，诛杀不止，成为了东汉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基本形象。这就是范晔增立《宦者列传》的背景。

处在两大集团之间的士人，不是附此，便是依彼，两大集团也都争取他们的依附，以扩大声势。因此士人在东汉也渐渐形成气候，成为第三大政治集团，反过来成为宦官集团的眼中钉，演成了两次党锢之祸。可见东汉的这种政治争斗与混乱局面，都与太后临朝有着密切关系。《皇后纪·序》说：由于太后临朝，“湮灭连踵，倾轹继路，而赴蹈不息，礁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诗》、《书》所叹，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显然，这种把一切争斗与混乱都归之于太后临朝的评论，是失之偏颇的。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范晔《皇后纪》一篇之增，确是抓住了东汉的政治特点的结果。

迫害士人的党锢之祸，是东汉之前所未曾有过的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出身于士族的范晔，是带着特殊的思想感情来记述东汉士人的。他认为“桓灵之间，主荒政缪”的原因，是“国命委于阉寺”。这些宦竖，“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闼房闼之任”，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职业与社会地位。他们仗主子之势，“舞文巧态，作惠作威”，“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结果是，“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范晔感叹道：“汉之纲纪大乱矣！”^⑫在这种情况下，一批鲠直的士人乃奋起抗争。用范晔的话说，“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⑬而党锢之祸，也就同时兴起了。赵翼《廿二史劄记》评论说：“朝政乱则清流之祸愈烈，党人之立名及举世慕其名，皆国家之激成之也。”这大概就是范晔立《党锢列传》的旨意。

范晔认为，士人与宦官本非同类，“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故势难两立，斗争的存在是必然的。《李杜列传》评论奏请“罢退宦官，去其权重”，并与外戚梁冀争斗的李固说：“顺桓之间，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陈王列传》评论与宦官侯览等争斗的陈蕃说：“桓灵之世，若

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成，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馀年间，数公之力也。”李固、陈蕃及其他死于党祸的李膺、范滂、贾彪等等，是范曄大书特书的正面士人典型。《党锢列传》的最末二句写道：“徒恨芳膏，煎灼灯明。”他认为，士人在斗争中成为了牺牲品，燃烧了自己，却照亮了别人。

东汉士人是尚名节的。赵翼分析说：东汉时期，“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②范曄为实录这一时代特征，为歌颂尚名节的士人，即使对那些并无赫赫业绩，但言行有一二可取之处的所谓“独行者”，也特为立传颂扬。如，能习《礼经》的刘茂勇负太守逃脱了赤眉军的攻杀，主簿卫福在战场上以身护主将，范曄称颂他们“志刚金石”。又如，出身“族姓”的陆续、会稽君仓曹掾戴就冤系诏狱，面临斧钺，仍然固守对主子的信用，顽强不招，范曄称颂他们“意严冬霜”。又如，“少游太学”的范式与张劭，生是同窗，逝世后结为“死友”，范曄称颂他们“结朋协好，幽明共心”。总之，这些人被认为“操作俱绝”，“良有风轨足怀者”。范曄的史笔触及这些下层士人，拓宽了史学眼界，扩大了史学题材。这是他对以浓彩重墨描写豫让、聂政、荆轲、侯嬴等人的《史记》的史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在党祸大兴、人人自危的环境中，有些士人“荣华丘壑，甘是柘槁”，以隐居山林而求高义，以终身不仕而求令名。范曄称赞他们的处世特点是，“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他们的代表是郭太、符融、许劭等人，范曄特为立传，旨在表彰他们“识深甄藻”，“守节好耻”。这类逸民即使处于汉室中兴，“汉德重开”之际，也“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他们之中，有的人因淡于名利，不愿困扰于纷乱的事世之中，故超凡脱俗，“道就虚全，事违尘枉”。有的人因对现政权与时风另有看法，由鄙夷而拒绝合作。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垂钓富春江，虽多次征召而不就，便是典型一例。他对旧友侯霸说：“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明显地透露出他对一批当权者的不满。还有的之所以成为逸民，却是为了避祸。范曄引用扬雄的“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的话后，说：“言其违患之远也。”所以，这些士人“江海冥天，山林长住”。逸民的情况是不一的，而不肯为当朝尽忠效力，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逸民列传》更有一特例，写汉阴一老父，当着尚书郎张温的面说：“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他直斥汉桓帝，显示了不畏的权贵的品格。《论语·尧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是从正面说的。从另一面说，如果政通人和，必会人人踊跃，报国效劳还觉得来不及，何来逸民？逸民多，是世乱的一个表现；东汉的逸民，正是党锢之祸的副产品。所以范曄增立《逸民列传》。

《后汉书》除了上承《史》、《汉》，设置《儒林列传》以纪述经学源流外，又增辟《文苑列传》，以记载因诗赋文章而著名的士人，反映了“东京以还，文胜篇富”^③的实际，并为后世史学开创了先例。而《宦者列传》表达了作者对“败国蠹政”的宦官的愤慨与指斥，它与《党锢列传》一起寄托了作者对“离被灾毒”的士人的同情与赞美，再加上作者着意撰写的独行、逸民二列传及其他人物合传，东汉各阶层士人的群像便全面地勾勒了出来，东汉的时代和政治特征也清晰地呈现在后人面前。所以，范曄新增的《皇后纪》和七

个类传，是他“正一代得失”的业绩，是他的史识的集中体现。在《班彪列传》中，范曄借华峤的话评论说：“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故范曄撰《后汉书》，“力矫班氏之失，加党锢、逸民等传，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而诸列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其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②。清人王鸣盛的这些话，人多以为至论。

鞭宦官而尊士人，固为范曄“正一代得失”的传神之笔，然而，宦官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总是随着皇帝对他们的宠幸的消失而垮台，倒是那些爬上大官高爵，成为“族姓”、“衣冠望族”之后的士人们，同样是“兰蕕并存”，其卑劣者左右政局，兴风作浪，祸国殃民，较之宦官，常过而无不及。如四世五公的袁绍兄弟即是一例。而范曄竟无一语鞭挞，反而歌颂他们“盛乎哉，其所资也”。可见，范曄的“正一代得失”，具有无法逾越的深刻局限。

至于范曄受西汉刘向的影响，在“正史”中增加《列女传》，实为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使后来“诸史相沿，莫能刊削”^③。封建社会中的妇女，历来被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的独立人格，她们的智慧与创造性，是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她们的辛酸悲苦，也是不被人们所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的。记述这些“才行尤高秀者”的《列女传》，为后人留下了中国第一个女史学家班昭的行状，留下了蔡文姬那样脍炙人口的《悲愤诗》，留下了赵媛姜那样甘心牺牲自己而掩护起义失败的大夫潜逃的英雄形象，还留下了一批夫妻相敬如宾，劝夫修学归正，事亲有礼，训子有方，不嫌贫，勤劳动的妇女典型，为中国传统美德的确立与发扬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也是范曄的史识的一个重要表现。《列女传》也宣扬了封建伦理道德，例如《女戒》之类。这是一千五百年前的古人所无法避免的。至于后来有人移花接木，把《列女传》改为《烈女传》，则与范曄的初衷已相去甚远，不屑挂齿了。

范曄《后汉书》的史学成就，首先取决于他的史识，其次也与他善于利用前人的成果有关。任何一个伟大的学问家和科学家，没有不是踩着前人的肩膀去登上自己的科学殿堂的；不掌握信息，不了解已有的成果，不善于把前人的研究终点作为自己的研究起点的人，可以说寸步难行。东汉时期，历代皇帝是重视修史的，从明帝到灵帝，不断命史臣在南宫的东观撰修，故名《东观汉记》，共一百四十三卷。魏晋以降，私家修东汉史者，达十四家，除范曄外，计有三国吴人谢承撰《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人薛莹撰《后汉纪》一百卷、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撰《汉后书》九十七卷、谢忱撰《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袁宏撰《后汉纪》三十卷、袁山松撰《后汉书》一百卷、张璠撰《后汉纪》三十卷、张莹撰《后汉南记》五十五卷，南朝宋人刘义庆撰《后汉书》五十八卷，及在范曄之后的梁人萧子显撰《后汉书》一百卷、张缵撰《后汉略》二十五卷、王韶撰《后汉林》二百卷。十四家中，今仅存范曄之书与袁宏之纪，其余十二家则于两宋之际早已烟消云散。范曄未必对上述十家（除萧子显、张缵、王韶之书）都看见过，都研究过。但范曄撰史，除主要取材于《东观汉记》外，至少谢承的《后汉书》、袁宏的《后汉纪》与华

峤的《汉后书》是他的重要借鉴与素材来源。此外,《后汉书》与《三国志》有十六篇列传篇目相同,但较《三国志》记之较详,其补充的史料多引自裴松之的注。范比裴年少二十岁,征引裴注,自亦自然之事。至于华峤之书,自问世后,即被同时代人认为“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②,因而得与《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均藏秘府,并行于世。后人对华书也多所推崇,认为晋宋间诸东汉史著中,“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③,“推其所长,华氏居最”^④。范晔也极服膺华峤书,并继承了它的许多优点。例如,立东汉《皇后纪》,便是由华峤首创而范晔承袭光大的。华峤认为“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所以他“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⑤。立《皇后纪》,华峤的本意是认为“皇后配天作合”,仅仅从人伦上着眼,而范晔则是认为皇后临朝,“莫不定策帷帘”,造成了政治上的严重后果。两相比较,显然范晔是推陈出新,继承了华峤书之形,而改变了华峤书之实。又,据李贤《注》所言,《章帝纪》论,《马武传》论的前六句,《冯衍传》论的前十三句,卷三十九的长篇序言,《班彪列传》篇末那段论述司马迁和班氏父子异同的重要文字,以及《袁安传》论等,均“华峤之词也”。李贤去南朝之世未远,容或言之有据。可见范晔《后汉书》,乃“发源《东观》”^⑥,并参照同类著作,删烦补略,爬梳董理而后成。唐人刘知己《史通》说:“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宋人叶适也说:后汉时期,“东观汉记,前后相承,范晔所以能述史二百年之后,由有诸家旧书也。”^⑦然而,范氏并非一味承袭,而多所创新。这正如刘知己所说,“观其所取,颇有奇工”^⑧。范晔本人也说:“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在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⑨虽然范晔谦称他的话为“称情狂言”,但他的《后汉书》能摆脱其他十来种同类书那样遭湮灭的厄运,大概还是因为它“颇有奇工”、“体大而思精”、能紧紧围绕“正一代得失”的史学目的来取舍史料的缘故。

注释:

-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 ②①⑤③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 ③《后汉书·皇后纪》注引沈约《谢俨传》。 ④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 ⑤③④⑤④刘知己《史通》之《书志》、《论赞》、《论赞》、《古今正史》、《书事》。 ⑥②邵晋涵《南江书录》。 ⑦⑧《孟子》之《离娄下》、《滕文公下》。 ⑨《史记·太史公自序》。 ⑩②④章学诚《文史通义》之《书教下》、《书教中》。 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 ⑫何焯《义门读书记》。 ⑬②赵翼《廿二史劄记》。 ⑭③③见《后汉书》之《宦官列传》、《党锢列传》。 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 ⑯②⑦《晋书·华峤传》。 ⑰②②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⑱叶适《习学记言序目》。

总 目 录

上册

凡例

序

《后汉书》述略

《后汉书》的“正一代得失”

卷一至卷四十二(1—1172)

中册

卷四十三至卷八十三(1173—2278)

下册

卷八十四至卷九十(2279—2475)

(一)律历志(2476)

(二)礼仪志(2558)

(三)祭祀志(2594)

(四)天文志(2621)

(五)五行志(2660)

(六)郡国志(2745)

(七)百官志(2855)

(八)舆服志(2905)

狱中与诸甥侄书

司马彪传

后汉书注补志序

附录:地名录、职官录等

后记